

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的转变

才 日 昕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 全球化所伴随的社会变迁改变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式, 而人类学将书写民族志作为阐述他者文化的方式, 也随之发生改变。从人类学诞生初期摇椅上的研究, 到用所研究民族的语言书写, 再到关注全球化与本土化互动中的书写模式, 这一学科经历了一个对异文化描述不断深入的过程。

关键词: 全球化; 民族志; 书写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20(2015)01-0068-05

DOI: 10.13874/j.cnki.62-1171/g4.2015.01.013

一、研究概况

人类学在传统意义上将自己定义为针对非工业社会的研究, 即“原始社会”、“异域社会”的研究。但由于20世纪以来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一方面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伴随着全球化的同质而减少, 地球上的几乎所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被整合到了一个更大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系统中; 另一方面, 被20世纪初期的人类学家视为异邦的民族也开始了人类学的研究, 学者之间的交流丰富了之前的民族志的材料, 但也带来了对其真实性、准确性的质疑, 学者们质疑民族志的书写究竟是文学的还是科学的, 之前民族志的权威地位发生了动摇, 特别是之前“文明”、“野蛮”这种二分法被认为过于简单而不再提倡。所带来的后果就是, 虽然研究人员与全球化抢时间, 想尽快的记录一些即将要在地球表面消失的异域文化, 但也开始更注重书写的方式。

笔者在本文中侧重于通过对20世纪以来中

外经典民族志的梳理, 描述它书写模式的转变过程, 并分析伴随着全球化过程的社会变迁和各民族、区域之间接触过程, 而全球化作为这一背景也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一种不可忽视的现象, 它的出现的发展极大地形塑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对于全球化, 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现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前, 当一些帝国开始对外扩张及将他们的宗教教义予以四处传播时, 早期全球化(proto-globalization)就已经启动了。^①但关于全球化的研究却是在资本主义对外进行扩张、争夺殖民地之后兴起的, 也产生了像罗兰·罗伯森(R. Robertson)、沃勒斯坦(I. Wallerstein)、贝尔(Daniel Bell)、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等理论家。

二、民族志书写模式的转变

(一) 20世纪初的民族志

在20世纪初期, 人类学作为一个学科已经在西方产生, 并产生了第一位人类学的教授爱德华·泰勒, 所以也可以把这一产生自英国的

收稿日期: 2014-11-20

作者简介: 才日昕(1986—), 男, 辽宁锦州人, 贵州大学生态民族学专业2014级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生态民族学、语言人类学。

学科与当时英国的环境结合起来，称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类学。与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相比，当时的西方社会内部相对和平，在全球经济和国际关系中占据的霸权地位也逐渐稳固，与中世纪以来各国常年的征战形成对比，也被称为“百年和平时期”。而这一时期西方各国殖民地的拓展也迫切的需要了解被殖民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人类学正是迎合了这种需求。通过开展人类学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加深对异邦的了解从而更方便统治和管理；另一方面，可以借此机会用西方社会的思维模式同化殖民地的上层统治者，使之心安理得的接受统治。

这一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类学家有泰勒、弗雷泽、涂尔干、莫斯等人。他们之所以被之后的学者们称为“摇椅上的人类学家”，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民族志很大程度上是仅凭借文献和文字对异邦文化进行描述，而这些作品在经过后辈的研究者进行实地田野调查检验后就会发现含有大量的猜测和想象，这种表述就丧失了民族志要求的最基本的真实性。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些学者更多的是认为没有必要亲自去作田野调查，甚至把所研究的对象看做野蛮人，认为与他们接触是一种耻辱。例如，弗雷泽就曾激烈的反对与被他所描写的种群的接触；莫斯虽然没有亲身做过田野调查，但根据他的学生杜蒙回忆，也曾在学校开设调查方法的课程。可见这些学者并非都是忽视开展实地调查的重要性，他们的身上带有一种那个时代人类学者处理、运用文献材料的自信，如果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学者们的社会语境，只是一味的嘲笑这些学者，也是不客观的，甚至对于理解他们的思想也是一种阻碍。

根据罗兰·罗伯森的观点，全球化不是新近的事，大约从15世纪初期到18世纪中期就开始发生在欧洲，并呈现出以下特征：民族国家共同体形成，天主教会范围扩大，个人观念和入道思想受到强调，世界日心说和近代地理学开始出现，太阳历使用范围扩大。^②沃勒斯坦在论述他的“世界体系”理论时也是持相同观

点，认为全球化与15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是同步的。由此可以看出，20世纪初期只是全球化的开端，它的表征还不明显，对世界的影响也很有限，学术界没有认识到它的意义，也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在这种背景下，进行人类学民族志书写的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书写很难得到书写对象的反馈。他们的研究对象大多生活在类似于费孝通先生所论述的乡土社会中，即不需要使用文字就能保持正常社会秩序。另一方面，20世纪初期正是进化论和传播论发挥影响的时期，这些理论倡导寻根溯源研究问题，在信奉物种进化的前提下试图构建文化史，把异族文化看作文化的早期阶段，是时间上的他者。传播论的发展也得益于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国家在科技上的进步，尤其是地理学、博物馆学等，在传播学派的正宗德国的文化圈学派，占主体地位的书写范式就是在认同文明区域性、每个区域都有文化的创造和变迁中心的前提下，通过比较的办法来构建文化的传播过程。总之，在全球化的初期，民族志的书写有着受当时环境影响下无法认识到的缺陷。

（二）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民族志

两次世界大战给全人类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人类学的研究却并没有停滞，相反，大量的民族志作品在这一时期涌现。世界大战是国家之间利益分化、矛盾无法调节的集中体现，西方国家国力衰减，殖民地大量丧失，因工业革命取得的成果在战火中毁灭，对自身文明的自信心也受到怀疑。西方国家被迫反思自身，而人类学素以通过研究他者达到反思自己的目的的一门学科，必然受到影响，借此转变研究范式。之前的进化论坚持西方中心主义，这时已经发生了动摇，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这些之前的二分法显得简单、不再符合实际。

这一时期，英国的功能主义和美国的文化相对主义占据了人类学理论的核心位置。前者以“功能”作为文化分析的工具，侧重于在一个文化整体观的前提下把人类的需求与社会的

发展联系在一起；后者推崇历史特殊论，认为所有社会和文化都有其自身的历史，不能把他们用一个普遍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这两种理论的兴起是与两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各国的接触、碰撞密不可分的，在这一过程中，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学者开展了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并且采用异邦的语言书写民族志，确立了民族志书写的典范。但虽然可以说全球化的发展促进了人类学范式的革新，但马林诺夫斯基主张的在“隔离的社区”内部研究文化，解释文化内部满足人的需要的功能的方法，仍是有缺陷的，忽视了不同文化、尤其是众多小族群的文化的接触，这一点已经被之后沿着马林诺夫斯基的道路、对他的田野调查地点进行回访的许多学者验证了。后来费孝通先生也曾在文章中指出，马老师在非洲访问，看到了当地文化与外来的殖民文化互动的生动情景，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提出“隔离的社区”的研究方法必须改变以适应于一个新的文化动态中的世界，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广泛的文化接触的变化路线，马老师生前已经预见。^③

（三）20世纪中叶以来的民族志

两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都得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期，20世纪50~60年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一个经济上的高速增长。60年代也正是全球化理论得以出现的时期，罗兰·罗伯森是研究全球化理论的前驱，他提出在审视想象时要把视野放宽到世界历史中去；而沃勒斯坦在批判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世界体系理论，把世界划分为核心、半边缘和边缘三个区域，虽然三个区域是一种共存的关系，但核心区在全球生产——消费体系中是处于优势地位的，后两者既受它剥削，又依附于它。核心区、半边缘区与边缘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它们的地位会互相转化。贝尔对全球化持积极的态度，在他看来，全球化已经使世界变得多元，后工业社会已经来临，意识形态已经终结。阿帕杜莱在全球文化景观

理论中将全球文化想象为5种“图景”汇聚而成，但这些图景呈现出明显的断裂和差异，并不在一个节点上交叉，相同的图景在不同的语境下也呈现出差异的状态，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分析全球文化的具体、新颖的理论框架，其中这5中图景分别为人种图景、科技图景、金融图景、媒体图景和意识形态图景。^④

这些理论家都通过建构一种分析模式来描绘全球化的场景，而这一时期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之前的殖民地纷纷取得独立，这样一来宗主国的学者就不能任意选择调查地点了，一种本土化的研究方向也随之兴起，可称之为家乡作业(homework)。同时另一种家乡作业，在殖民地成长起来的、之前被视作观察对象的群体也有人从事田野工作，为不同地区的跨文化比较打下了基础。

这一时期的民族志也如同蓬勃兴起的全球化理论一样，呈现出一种发散性、多元性、碎片化的特点，有结构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仪式研究、阐释人类学研究等。但笔者看来，有一类受到全球化理论的影响、在书写中侧重于社会变迁以及由于外来文化的到来而被迫做出改变的一类研究，也是很能代表这一时期人类学的学科走向的。例如，康拉德·科塔克在巴西小渔村阿伦贝皮长达40年的跟踪调查，记录了这里居民生活中的一切，特别是40年来的变迁，并撰写了民族志《远逝的天堂》。书中记录了在这段时间内，小渔村被全球化的浪潮纳入到世界体系中，传统的生活方式被抛去，迅速地向现代社会靠拢，并由此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因为同时被抛去的还有建立在当地独有物质体系基础之上的精神生活，而一旦进入全球化的进程中，想要回头就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类似的研究还有西敏司(Sidney Mintz)关于糖的研究以及陶西格(Michael Taussig)关于南美洲人民对于魔鬼信仰的研究。

（四）中国人类学民族志的转变

人类学发端于欧美，中国早期的人类学家大多留学海外，并把西方的研究理论、研究方

法带回国内，把它作为分析中国问题的工具。并且根据所学不同，在中国形成不同的派别。简而言之，人类学在中国诞生的初期也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理论的延伸，在中国这块田野中检验西方的理论，并以期获得本土化的理论。例如当时的费孝通、林耀华等功能学派的传人也是采用功能主义范式书写民族志。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学者没有创新，不能借它山之石以攻玉。留学于英国的费孝通先生的代表作《江村经济》就得到了功能学派大师马林诺夫斯基的盛赞，认为这是一部开启了人类学家研究自己民族的先河，从研究自己最后达到自知之明。但费先生是以“志在富民”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的，所以在这部描写中国农民的生产、分配、交易和消费的书中，他提到了中国的农民尽管勤劳，但仍然不富裕，根源就在于外国的竞争者利用其在全球贸易的优势地位，人为地降低中国产品的价格，只有摆脱这种不利的地位，才能实现富裕的目标。费先生的观点其实是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处的，因为在当时，中国确实处于一个沃勒斯坦所说的边缘地位，自身发展受到体系的限制。这也是费先生看到了当时的全球化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如何能在全球化中化被动融入为主动输出则是中国亟需要实现的。笔者认为，费先生之所以能看到中国问题的核心，书写出经典的民族志，是与他能够和被研究者良好的互动、互相理解密不可分的，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和费先生一样，常在乡土间行走。

改革开放后中国加快了与各国的接触，不仅融入到了全球市场中，而且成为了能够左右全球化进程的大国之一。而中国人类学也顺应了这一趋势，开始走出国门，进行海外民族志的书写，尤其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使中国和东盟各国往来密切，印尼、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这几个国家更为人们所关注，其中印尼在专门的东南亚学者中被关注得最为频繁。^⑤到2014年为止，在海外从事正规田野工作的学者已超过50人，田野点遍及全球六大洲

(约30个国家)，完成民族志著作15部、相关成果30余项，此外，还有不少正在进行的研究。^⑥从短期来看，尽管中国还不富裕，书写海外民族志的成本较高，但从长远来看，海外民族志会为中国人类学的研究增加新的他者，获得新的经验，从而反观自我，在自我与他者的比较重获得对自我更深刻的认识，从整体上拓宽人类学的研究范围。

全球化使中国加快了人口流动的同时，带来了不同文化的交融，这里的文化既有来自外国的文化，同时又有中国不同地区的文化。因为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环境多样化、地区差异性明显，加快的人口流动会使这些差异性发生碰撞，创造新的互动，而这正是人类学需要记录、研究的。

三、讨论

书写作为一种常识在每个人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并内化为一种技巧。而书写所依靠的文字在封建社会则是统治阶级管理国家的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说书写者和被书写者之间天然就存在着不平等，后者不能表述自己，只能依靠前者。在充满臆断的想象中，被书写者很容易被描述成“没有历史的人”。随着英美人类学界后现代学派的兴起，人类学民族志的书写逐渐被看作一种实践方式，之前人类学家那种“支配型的知识”逐渐让步，书写者与被书写者之间是否有良好的互动、是否能在互动中达到互相理解成为衡量民族志是否真实、精彩的标志。

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完全融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中了，完全与外界隔离的小社区如今已经找不到了，工业化的产品也已遍布地球的每个角落。一些学者就曾探讨人类学是否会因全球化对地方文化的同质作用而失去研究价值，在笔者看来大可不必为此担心，因为这是一个全球化与地方文化的互动过程，后者会有选择的接受前者并实现本土文化的重构，就像华琛(James Watson)在香港所做的关于麦当劳文化的研究一样。

所以,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正确使用已经作为一种普遍文化表述方式的书写成为了我们探讨的重点,这是一种人人可以实践的方式,而且正被每个人所实践着。而笔者认为,只有把书写看作是一个需要经常修订的文本,一个仅仅代表个人思想、体验、感受的符号体系,才能找到其真正的意义。

注释:

- ① 罗慧敏. 全球化理论综述 [J]. 社会, 2004(3).
- ② 明栋才. 当代西方全球化理论研究综述 [J]. 重庆社会科学, 2007(10).
- ③ 费孝通. 百年中国社会变迁与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自觉” [J]. 厦门大学学报, 2000(4).
- ④ 周娟. 阿帕杜莱的全球文化景观论 [J]. 国外社会科学, 2009(11).
- ⑤ 康敏. 民族志书写——中国人理解海外社会的突破口 [J]. 西北民族研究, 2010(01).
- ⑥ 杨春宇. 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定位中国人类学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4-06-27].

参考文献:

- [1] 庄孔韶. 人类学通论 [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2.
- [2] 王铭铭. 西方人类学名著提要 [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4.
- [3] 弗雷德里克·巴特. 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4] 费孝通. 江村经济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5] [美]康拉德·科塔克. 远逝的天堂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6] [美]西敏司. 甜与权力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7] [挪威]托马斯·许兰德·埃里克森. 小地方, 大论题——社会文化人类学导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8] [美]乔治·马尔库斯, 米开尔·费彻尔.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 [9] [英]奈杰尔·拉波特, 乔安娜·奥弗林. 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The Transition of the Anthropological Ethnography Writ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Cai Ri - xin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25)

Abstract: Globalization along with the social changes brought a paradigm - shifting to the anthropology. And the writing ethnography as a way of elaborate the others' culture , also be changed accordingly. From a rocking chair' s style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birth of anthropology research , to use the be studied national language to write , and then to focus on the writing pattern of between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teraction , this subject has experienced a process of further study of different culture.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Ethnography; Writing

[责任编辑: 戴锦秀]